

张学良亲自命令我“捉蒋”

亲历者讲述西安事变时执行华清池“捉蒋”任务的前前后后

□王玉瓚

张学良将军曾有两个卫队营，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。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，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。1936年12月12日，我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指挥下，作为“捉蒋”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，执行了华清池“捉蒋”任务。

张学良屡次“苦谏”不成

蒋介石在平息“两广事变”后，为准备解决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和红军“三位一体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他以避寿为名，飞至洛阳积极筹谋划策，派兵遣将。部署完毕后，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，住在事先准备的行辕临潼县华清池里。

在蒋到达的前两天，张学良副司令派我率卫队第一营的步、骑兵各一连，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下定决心：坚决不打内战，坚决不离开西北。他们的计划是：第一步“苦谏”，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；如果苦谏无效，就采取第二步“兵谏”，派兵捉蒋，逼他抗日。

12月7日，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蒋之行辕，想以至诚说服蒋介石。蒋介石竟拍案大怒，训斥张学良是非不明，缓急倒置，不积极“剿共”，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，实属年轻无知。随后杨虎城又去劝说，也为蒋所拒绝。

这时已经到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。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，西安市各大中学学生以及沿途众多的市民一万多人，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，向张、杨请愿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。

12月10日，张副司令又到华清池的五间厅进行“争谏”，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，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，倘再一意孤行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。但仍然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拒绝。

张学良命令我把蒋介石“请”进城

1936年12月11日下午4时许，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话完后出来，走到头道门时，我正在那里值勤。他看到我，说：“王营长，跟我回城里一趟！”

“是！”我立即回答。说完，他上汽车走了。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。

我们很快来到东门里东大街路南的金家巷一号。我在门外下了车，就停了下来。张副司令见我未跟上，就说：“来。”我这才跟他到了西楼的客厅。我光顾着跟他走，竟忘记了关门。他对我说：“关上门。”我关门后，立正站在客厅里，屋里就我们俩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目光严峻而坚定地对我说：“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！”

我听到这“请”的一瞬间，心里马上犯了合计：你刚从他那儿回来，怎么还让我“请”呢？

“要抓活的，不许打死他！”张副司令继续说。

我立即意识到“兵谏”的时候到了，便非常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保证完成任务！蒋之侍卫二十人，池外宪兵也不超过十人。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，保证捉来！”

他见我很有信心，十分满意地瞧瞧我，像同意，又像嘉许，并以深沉的口气说：“明天，你死我死都说



西安事变时的王玉瓚

2014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8周年。关于“捉蒋”的过程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本文是“捉蒋”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王玉瓚的文章，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当中的细节。

不定，要有思想准备，做好行动部署！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。”接着又说：“你营是华清池守卫者，应先行动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五十一军的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。于军长连声“副司令”也没叫，就神色急迫地问：“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”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，而是继续让我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，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，免得夜间动手时遭误伤害。具体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知。

我告别了张副司令，来到中楼找到谭海，把受命情况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好。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。你先换衣服吧。”他令卫兵把衣服拿来。当夜，我就在谭副官长的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阵儿，床上靠一会儿，但一点也不想睡，总寻思着如何完成张副司令交付的重任。

我打响了西安事变的头三枪

好不容易熬到了12日凌晨2时许，我告别了谭海，跨上三轮摩托火速出城。先到十里铺，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，传达了“捉蒋”命令，令他们立即策马前往，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，逮捕一切外逃人员。随后又赶到灞桥，令手枪排长金万普迅速到华清池参加“捉蒋”。接着赶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，让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、匡德润、王金铭等找到一起，部署“捉蒋”事宜。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，还住着一些宪兵，我令王世民马上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。

等一切安排妥当，我便带领王世民、马体玉等一连战士，进入头道门，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。

此时，晨4时许。临潼原野，风寒天冷，一片寂静。穿过庭院，三园门已近在眼前。黑夜里，只见一个蒋的哨哨来回走动。我掏出手枪，对着他连击三发，然后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，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。我头一枪就把门内的哨兵打倒了。于是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华清池“捉蒋”之幕拉开了，我也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

责者，变成了一名“捉蒋”的先行官。

当我率王世民、马体玉等冲进三园门时，蒋的卫士长跑出房门，连声喊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我们哪里理他，几枪把他击毙。顿时，枪声大作，子弹横飞。这时，孙铭九中校率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名官兵，我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，也乘车赶来参加战斗。

我和王世民等借助黑影和廊亭，翻过荷花阁，绕过贵妃池，跃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，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，就飞步冲入蒋介石的卧室。见床上没有人，被子还掀着，我们就急忙瞧床下，也没发现人。但是，衣服挂在衣架上，桌上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。我们察觉蒋介石已经逃走，但又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，心急如焚，焦灼万端。

我急忙跨到五间厅外，令官兵四处寻找。这时，又传来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：捉不到蒋，以叛逆论处！不一会儿，一连战士石志中急忙跑来报告：在五间厅外的后墙根处发现蒋的一只鞋，我们当即意识到，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向后山了。急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索，孙营长则令他营战士从右侧搜索后山。我随即跨过飞虹桥，闯出开阳门，同士兵们一起上山捉拿蒋介石。

这时，天已微明。满是乱石和树杈子的骊山北坡，上上下下尽是搜蒋的士兵。在距五间厅500米开外的半山腰上，躲在一块大石后边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，不时探出头来，窥视四周动静。这情况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发现，于是，连声大喊：“委员长在这儿哪！在这儿哪！”我闻声跑去。这就是今天骊山“捉蒋亭”所在地。我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。这时，他已失去平常的威风，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、白色睡裤，光头跣足，面色苍白，狼狈不堪，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，连问：张副司令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场的并没有人理他。这工夫，也不知是谁打趣地吹起了“接官”号，大家更感到滑稽有趣了。

使命完成之后张学良奖励我5000元

张副司令交代的“捉蒋”任务完成了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当时孙铭九带的几十个人是乘汽车来参加“捉蒋”的，只有他手下有车。我一见一〇五师的师长刘多荃也在现场，就请他送蒋回城。刘师长说：蒋介石认识我，我送他不方便。8时许，大家把蒋塞进一辆小车里，由谭海等人押送回西安新城大楼。那里是张、杨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。

临潼捉蒋的同时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，一面包围西京招待所，把蒋鼎文、陈诚等二十几个军政大员抓住了，软禁在西京招待所；一面解除了西安的宪兵第二团、省公安局别动大队的武器，接管了老机场。

华清池“捉蒋”一仗，蒋之侍卫全部被解决。

蒋介石的假牙、斗篷及日记，是一营一连二排排长匡德润最先拿到的。而华清池的善后，是由一〇五师一旅二营机枪二连连长葛志先负责处理的。

华清池“捉蒋”成功，张副司令奖励我5000元，还提升我当了东北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。由于担任了野战部队团长，卢沟桥事变后，随即奉命开赴华北和上海抗日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

“白毛女”鼓励我上台表演

□刘冀东

提起曾偶遇“董存瑞”张良、“白毛女”田华的事，我现在仍觉得很荣幸。

英雄“董存瑞”站在面前

我于1961年入伍。1965年，我被选送到在广东花县举办的枪炮、弹药技师培训班深造。培训结束回部队前，我住进了广州军区三招待所。这天上午，我在院内报亭看报，有两位年长些的军人也来到报亭，一位是上尉军衔，一位大尉军衔。无意中，我发现那位上尉像是在哪里见过。上尉发现我目不斜视地看着他，风趣地说：“小同志，我们见过面，一定见过面！”一瞬间，我突然知道他是谁了，失态地大喊：“你是董存瑞，你是董存瑞。”他笑了笑说：“我叫张良，不过战友们都叫我董存瑞。”1956年上映的电影《董存瑞》深受人们喜爱，饰演董存瑞的张良成为明星。见银幕上的英雄董存瑞就站在面前，我心里很是激动。

田华邀请我“上去坐坐”

那时我对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感到很好奇，正想向张良请教一下，这时又走过来一位女军人，中校军衔。我忙



田华扮演的白毛女

向她举手敬礼，只是做梦也没想到，她竟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田华。1951年，田华主演的电影《白毛女》公映后红遍全国。

田华完全没有大腕明星的派头。她正在广州拍摄电影《秘密图纸》。到了剧组在招待所的房间，她拿出糖果给我吃，而我问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拍电影。田华说：“你来当演员就知道了，想当演员吗？”我连连摇头说：“我不行，从小就没什么文艺才能。”田华说：“你可以学嘛。”

有了田华的鼓励，回到部队后，在一次联欢会上，我第一次上台唱了首歌曲。然而，我最终没能像田华说的那样成为一名演员。据《快乐老人报》

我哥哥和林伯渠的儿子被“调包”

江西瑞金曾是中央临时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驻地，也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出生地。他们一位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林伯渠的儿子，叫苏生；一位是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的儿子，叫瑞生，后者是我的亲哥哥。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。

把红军的儿子送给老乡

1934年10月，两个男婴，两个红军的后代，大声啼哭着先后落地。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父母温暖的怀抱，而是敌军日益临近的枪炮声和中央红军仓促离开根据地的脚步。不得已，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将孩子们送到了堂嫂——发仔阿妈手中。范乐春含泪留下了一句话：这都是红军的娃崽，一个姓林，一个姓邓，拜托堂嫂你找人给养大吧。自此两个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亲生母亲，因为他们的母亲都在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。

出身赤贫的发仔阿妈心疼这两个带着红色印迹的婴儿，然而她不可能抚养两个孩子，就把出生仅三天、脐带还没脱落、连哭无力的我的哥哥留给自己，将另一个孩子转给赖姓人家抚养。

发仔阿妈给孩子起名叫范宜德，另一个叫赖平亚的孩子因高烧而导致一条腿残疾，而他的满姑阿妈很是疼爱这个苦命的孩子，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后，又送他去学做裁缝。

1949年初秋，我的父亲想起留在苏区的孩子们，就请赣州军管会的同志协助查找。没想到真的找到了。两个



邓子恢之子瑞生(左)和林伯渠之子苏生

望着苏生讲，这孩子和范乐春烈士(苏生哥哥的母亲)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太像了。于是，又派人去江西找范宜德的养母发仔阿妈。老人含泪说了实情：自从发现孩子腿不好，她一直觉得对不起牺牲的堂妹范乐春，是她没有照顾好这棵苗苗，所以有人来找孩子时，善良的她故意把一条腿有伤残的孩子送到了邓家，把她抚养的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。她最后坦白：范宜德(即林秉苏)是邓子恢的儿子；跛脚的赖平亚(即邓苏生)是林伯渠的儿子。

换错的两个孩子，该各归自家了，父亲为感激瑞金人民的养育之恩，又给秉苏取名邓瑞生；林老则只是给儿子把姓改为林，还叫苏生。苏生和瑞生两人都舍不得已经熟悉并产生感情的父母和姐妹，决定林家、邓家两家轮流住。据《党史博览》